

何以代表

郭建华 放映机后的光影半生

□徐晴子 王极

49年，一个人的半辈子。在这段漫长岁月里，郭建华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电影烙印。她说，自己只是做好农村电影放映这一件事，不过是做得久了一点。但在旁人看来，她的传奇人生，何尝不是一部精彩的大电影。

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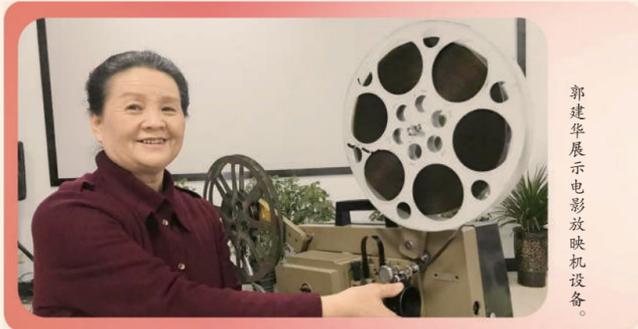
郭建华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，如果让她描述儿时一个记忆深刻的画面，她一定会提起那场夏夜里的露天电影和那块“白布”上的人。

六岁那年，父亲带郭建华到村里的麦场看电影。十里八乡的人都早早地到了，空地上座无虚席，草垛上、墙头上，甚至是树上都“长”满了人。

郭建华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钻来钻去，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前排，靠在了放映桌旁。望着幕布上活灵活现的人影，她跑上前伸手轻轻地触摸幕布，再跑回来好奇地问问边上的人：“这人又会说又会唱，咋跑到白布上去的？”正摆弄机器的放映员哈哈一笑，指着放映机发出的光告诉她，是这束光把人推到幕布上去的。“那咋会有颜色呢？”“这么多人进去了吗？”……架不住这些连问，放映员拍了拍郭建华的头，说等她长大后当放映员就明白了。

1976年，开封县（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）要招聘一批农村女电影放映员，23岁的郭建华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去参加考试，想着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可到了现场才发现，谁都不看好她这个又瘦又小、体重还不到80斤的小姑娘。

当时，电影放映员考试分为两大项：文化课和实际操作。在实际操作环节，考生被要求携带两个电影拷贝，骑20公里自行车测试体能。郭建华知道自己在体型方面不占优势，便主动加码，把20斤重的拷贝，她硬是带了四个。驮着比自己还重的东西，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。于是在这一年，郭建华如愿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。



郭建华展示电影放映机设备。

一句承诺，半生坚守

不久后，郭建华便跟着老师到村里放电影，刚当上电影放映员的地既兴奋又紧张：“原来都是坐在前面看，现在终于站到放映机后面了！”她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天要放的电影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场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幕布。当放映机的灯光亮起，“八一电影制片厂”的电影片头跳出来时，全场响起叫好声。郭建华这才长舒一口气，低头发现手心全是汗。

电影放多了，郭建华也和乡亲们日渐熟悉起来。有时乡亲们为了看电影，会端着碗、捧着筐，把饭拿到放映桌上。大家把煮熟的花生、毛豆、玉米、芋头放上放映桌，招呼郭建华一起吃。碰到年纪大点的乡亲，郭建华还会主动给他们讲解剧情。

有一次，郭建华连着放了四部电影，到了深夜，有个老乡仍是不让她收放映机，说想看个够：“现在总能看上电影，以后你嫁人了，就没人给我们放了！”郭建华哭笑不得，当下给出一个承诺：“只要乡亲们喜欢看，俺给你们放一辈子电影。”谁都没想到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让她坚守了49年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郭建华如约放着电影，她自己的人生大事也在放映场里“上演”着。1978年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在农村放映，郭建华当时已是孕晚期，但为了让乡亲们早点看上电影，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去3

个村。有一天电影还没放完，郭建华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，乡亲们急忙用板车把她拉到医院，孩子早产生了。丈夫使用《烈火中永生》的插曲《红梅赞》，给女儿取名“红梅”。1982年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时，郭建华仍是在放映场上，那时候放的是戏曲电影《包青天》。电影还没结束，她就被送到了医院，顺利生下了二女儿。《包青天》中有句唱词是“雪里梅花耐严寒”，郭建华便给女儿起名“雪梅”。

“坐在这个放映场，看着银幕上的故事，和乡亲们一起哭一起笑，我就是最幸福的。”郭建华说，“看电影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能短暂忘却生活中的烦恼，只管纯粹地笑、纯粹地哭。”

没有合适放的，就自己拍

1996年，郭建华被任命为开封县电影公司（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）经理，后任党支部书记。她不想离乡亲们太远，仍是定时定点带队去村里放电影。但她逐渐发觉，公司购买的部分影片内容有些过时了。

有一次电影放映结束，一位乡亲找到正在收拾设备的郭建华抱怨，科教电影里的种花生技术还没他自己的技术先进。当天晚上郭建华失眠了，一直琢磨着乡亲们的话。

天一亮，她就找到了河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商量，要为乡亲们放真正有用的电影，没有合适的，就自己拍。这个提议得到

了大家的一致通过。

郭建华想在有故事、有情节的基础上，穿插花生的种植技术。“只有爱看才会爱聊，爱聊才有更多的人愿意交流经验。”她的想法，导演王蕾明白，二人一拍即合，决定根据花生的生长周期拍摄。从选种、晾晒、拌种，到机械化播种、田间管理、病虫害防治，再到最终收获与储存，每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要真实、可操作。历时7个月，这部农村轻喜剧科教电影《咱家花生好收成》成功“出炉”了，乡亲们观看后纷纷表示喜欢。

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，郭建华年年都会把新花生带到全国两会上，她想让乡亲们看看，自己家乡的花生一年比一年种得好。

从乐趣到需求

对于电影，郭建华有自己的理解：“电影就是鲜活的人生教科书，一部好电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”

这些年为了挑选好电影，郭建华下了很多功夫。农村电影的放映，首先要做到题材老少皆宜。提起乡亲们的喜好，郭建华如数家珍，“大家就愿意看恶有恶报、善有善终的电影，他们希望这个社会是这样的。”郭建华介绍，近两年乡亲们反响最热烈的电影就是《第二十条》，她自己也特别喜欢：“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？”这句台词真痛快！

郭建华说，以前看电影是乐趣，现在看电影是需求。将较为生硬的普法做一些艺术化的加工，就可以同时满足乡亲们的娱乐需求和法治需求。

如今，72岁的郭建华仍奔波在不同村子之间，放映着一部部电影。谈及未来，她有几个展望：一是希望国家从政策、资金层面，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扶持力度；二是希望全社会重视校园电影的创作生产，给孩子们供应优质的“精神食粮”；三是希望老一辈电影放映员做好“传帮带”工作，培养更多年轻人，把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传承下去。“要让农民能一直看上最好的电影，看他们最喜欢的电影，看对他们有用的电影。”郭建华说。

徐立平 刀与火之歌



徐立平在雕刻火药。

□徐晴子 杨晓

在火药上微雕，不能有毫厘之差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发爆炸……每一次落刀，徐立平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在一下下巨大的心跳声中，发动机推进剂药面整形工作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7416厂首席技师徐立平一干就是38年。

儿时的苦和乐

徐立平的童年是在搬家中度过的。1968年，他出生在内蒙古，一岁时被送回母亲的老家四川泸州，由外公外婆照顾。4岁时，他重返内蒙古，回到父母身边。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1973年，徐立平又因父母工作地点的变动搬到了陕西，终于定居下来。

在父亲眼中，徐立平跟弟弟妹妹相比算不上聪明，所以总把“笨鸟先飞”挂在嘴边激励他，徐立平学习一直格外努力。在陕西上学时，条件比较艰苦，冬天没有暖气，都是烧炉子取暖。这让他发现了一种别样的美食——烤馒头。把馒头放在炉子上，不一会儿，馒头表面就会变成焦黄色，吃起来又脆又香。每次吃的时候，徐立平总会先吃馒头的芯，把最喜欢的硬壳留到最后慢慢品味。“先苦后甜嘛。”徐立平说。

生死一线的38年

1987年，19岁的徐立平从陕西第一航天技工学校毕业，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7416厂的一名发动机药面修理工，对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药面进行修理、开槽、挖药、修补等。徐立平解释：“通俗点讲，就是用刀‘雕刻’火药。”他在这里一干就是38年。

徐立平清晰地记得刚进厂时，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：“那时候师父带我去处理废药块儿，‘咣’一点火，紧跟着就是巨大轰鸣声，刺眼的火光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，哪怕站在十几米之外，席卷而来的热浪依旧让人难以忍受。”这节课，给徐立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也让他对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有了直观的认识。

1989年，一台火箭发动机在试车前被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，试车失败，上级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就地挖药。“这是咱们国家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地挖药，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。”21岁的徐立平主动请缨，成为挖药突击队最年轻的成员。

所谓“就地挖药”，就是钻进发动机燃烧室，挖开填注好的火药，查明问题根源，修复药面缺陷。发动机舱内空间狭小逼仄，只容得下一个人爬着进去，内里充斥着浓烈刺鼻的推进剂味道。身高近一米八的徐立平半跪半蹲，用木铲、铜铲一点一点地抠挖，每一刀只能挖四五克药。人在如此高度紧张又缺氧的环境中，时间一长，就会头痛、呕吐。因此，每个人每次只能在舱内停留10分钟。而徐立平觉得自己年轻，身体素质好，应该多干一点，每次都会多待上一会儿。就这样，历时两个多月，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公斤的推进剂，找到了故障原因。

这次任务完成后，徐立平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，他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，经过很长时间高强度的康复训练，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。

后来，徐立平成为班组长，主导挖药工作。凭借充分的准备和精湛的技术，他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，保持着零安全事故的纪录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挖药，但那段经历，成为徐立平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回忆。

离危险远一寸

如此高危的工作，徐立平却始终干劲儿满满：“再危险的工作也要有人做，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”他明白，想要最大限度地规避危险，唯有练好手中这把刀，他开始了日复一日地苦练。

为了尽可能减少失误发生，徐立平每天重复着“观察—判断—修正”的动作。他反复比划着切削、铲等基本动作，揣摩着刀具的切削角度和切削力度，每每练得手酸腿痛，才放下刀休息一会儿，然后继续练习。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整形要求，有的要求尺寸，有的要求形状。经年累月的刻苦磨炼，徐立平的手感越来越好，能够不出差错地完成每一项要求。“我要做的，就是按照产品要求整形到位，同时保证安全。”经由他手整形过的发动机推进剂药面，合格率达到了100%，创造了行业内的奇迹。

到了90年代，厂里引入首台数控整形机，徐立平主动学习数控编程知识，还动员年轻人共同探讨、模拟。在此过程中，他提出的20多个关于硬件方面的建议均被采纳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数控设备成功投入使用，推动了火药整形技术的升级。这一突破，不仅解决了生产效率，还提升了产品质量。“机器代替不了人，但能让人离危险远一寸。”徐立平说。

2005年，某型号发动机因传统刀具整形效率低下且危险，生产受阻，徐立平便开始自己设计制作刀具。经过三四个月的设计和多次技术迭代，“立平刀”诞生。这款刀具不仅解决了安全隐患，还将效率提升了50%，同时降低了操作难度。此后，徐立平陆续改进30余种刀具，其中9种获得国家专利。

收徒的两个标准

2017年，徐立平获得第十二届航空航天月桂奖“大国工匠奖”，后被评为2021年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。此外，徐立平还有许多头衔：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“时代楷模”、“最美奋斗者”等。但对于徒弟们来说，他只是个严格的师父。

徐立平对徒弟的要求非常严格，因为他始终记得，同事不慎将刀具碰到金属壳体，擦出的火花瞬间引爆发动机，当场牺牲。他希望通过最严格的要求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徐立平收徒有两个标准——稳当、灵活。“只有做事稳当，才能在我们组长久地工作，不容易出问题。”徐立平解释，“灵活就意味着愿意创新。”他非常注重培养徒弟的创新思维，团队申请的专利已经有50多项，授权十几项。在30余人的团队中，技师、高级技师占比达50%以上。徐立平希望他们能不断进步，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。

2023年初，徐立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。今年，他提出关于常态化、制度化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的建议。他认为，此类活动能够让更多学生了解工匠精神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，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。

因自身工作对安全有着极高的要求，徐立平也尤为关注公共领域的安全问题。他提出加强道路等公共设施预警能力建设的建议，希望加强预警信息体系建设，在道路桥梁等易发生灾害的地方安装传感器等，提升公共设施安全预警能力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。

“我们学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，但孩子们终究要长大，要走向社会的。”刘玲珊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融入社会，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，经营幸福的家庭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……不仅是“活下去”，还要“活得好”。

许多人并不了解，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和助听器，公共场所仍需设置听觉辅助设备，以确保助听设备的兼容性。目前听障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仍显不足。

刘玲珊认为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如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听障人士时，要求其裸耳听力

于洋 为生命奔跑

□徐晴子 史少君

于洋的时间总是不够用，在神经内科，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赛跑。23年间，她直面过太多生死考验，对护士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开始为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的社会性问题奔走呼吁。她是护士，也是“战士”，始终奔跑在挽救生命的战场上。

时间就是大脑

神经内科的护士有多忙？每每被问到这个问题，4年前一天的场景就会在于洋的脑中重现。

2021年5月13日，周四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。早上8时50分，一名患者前来就诊，表现为突发言语不清伴右侧肢体无力，接受问诊与查体后，当即被确诊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。医生果断将其转至病区抢救室，开启静脉溶栓治疗流程。就在抢救工作紧张进行时，又有两名患者因突发脑卒中相继就诊，需要进行溶栓治疗。

溶栓操作对于时间的要求极为严格，每耽误一秒，患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出现坏死，且不可逆转。所以在神经内科有一句——时间就是大脑。

医护人员立即启动紧急预案，把患者抢救时间窗，进行NIHSS评分，评估患者的适应证禁忌证、与家属沟通征得家属同意并签字……护士长于洋带领护士们与医疗团队默契配合，迅速将药品和抢救器材准备到位。

9时23分，第一位患者进行溶栓。9时30分，第二位患者开始溶栓。9时38分，护士为第三位患者静脉输入溶栓药。

10时38分，三位患者溶栓治疗相继顺利结束。原本存在言语含混、肢体抬举困难的患者，经过治疗后语言功能逐渐恢复，肢体活动基本正常。

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处理病房护理工作，16时，又有两名患者几乎同时进入神



于洋在病房中调整注射器。

经内科进行溶栓治疗。

“高强度、高密度，精神上高度紧张，那一天，全科室护理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，甚至顾不上吃饭休息。”于洋至今回想起来仍免不了深吸一口气。这是她的一天，也是许多神经内科护士的一天。

责任感、同理心与人文关怀

在于洋看来，护士是一份精力和体力都需要“超长待机”的工作。白天，他们推着叮当作响的处置车来回穿梭，处理医生查房后调整的医嘱，把新增的治疗输入执行序列表，沟通安抚因病痛而休息不好的患者……到了深夜，在各类监护仪器的闪烁中，护士们轻轻推开一扇扇门，逐床查看病人的情况，时不时还会听到病人和家属的小声抱怨。不知在哪个时刻，哪个监测仪会突如其来地发出尖锐报警声，接着是呼喊声、奔跑声、急救车的滑轮声，他们便又一次开始与死神赛跑。

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，是黑龙江首批28家急性脑卒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，高强度、快节奏的抢救工作是这间医院的高日常”。2002年6月，于洋在这里开启了她的护理生涯。

“我们经常比赛谁换气切套管和纱布

更轻柔，能使患者不发生刺激性咳嗽，减轻他们的痛苦。”于洋说，如果她护理的患者皮肤被压红了，她就会陷入自责。如果因及时发现患者瞳孔的变化，而为其争取最佳抢救时机，她会有成就感。

2015年7月，于洋被任命为神经内科四病区护士长，后又兼任护理部副主任。到今年，她已经在临床护理一线坚守了23个春秋。

作为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身兼教学重任的于洋非常关注护理人员培养的双重维度。她认为学生除了掌握静脉穿刺、急救设备操作等各项基础技能，更需要学会关心患者，理解患者的需求。“要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人文关怀。”于洋说。

为护士发声

2020年初，于洋主动请缨驰援武汉，担任黑龙江省第二批支援武汉抗疫医疗队副队长，带领团队承担重症患者护理工作。同年9月，因参与重大护理工作表现突出，于洋被授予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。这段经历，让她对护理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

“护士不依附于医生，他们之间是相互协作、相互支持的关系。”于洋介绍，护理学自2011年已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，护士有

自己的学科领域，需要掌握专业护理技能、保持高强度工作所需的体能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敏锐判断力。护士和医生是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角色，但很多人却将护士单纯地视作医生的助手，打针、发药、巡房，但远远非他们必备技能的全部。

“护士在工作中更频繁地接触患者，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和职业暴露风险。”基于这些职业特性，她呼吁完善护士权益保障体系，加快制定护士法等。

关注失能病患之困

脑梗死、脑栓塞、帕金森……神经内科以接诊脑血管疾病患者为主，危重病、卧床失能病人多，一些病患无法独立吃饭、穿衣、上厕所、洗澡等。于洋注意到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面前已不堪重负，许多家庭正面临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的困境。

因此，于洋建议加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将更多失能者纳入长期护理保障范围，进一步解决和满足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需求。

同时，由于社会上失能病患的照护需求量大，“网约护士”“上门护理师”等照护形式开始涌现。在2024年两会上，于洋提交了《关于全面开展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的建议》。她认为，这种模式有助于破解千万失能、半失能老人的居家护理难题，但亟须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、质量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。“必须构建医疗机构、互联网平台、保险机构的三方协作机制，才能打通专业护理到家庭的‘最后一公里’。”于洋说。

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明确提出“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”，标志着长期护理从试点阶段向全国范围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。

“看到自己关注的问题，所提的建议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，我很开心。”于洋认为，随着我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3亿，这项承载着民生的制度创新，正在重塑老龄化社会的照护生态。

的考上公务员，有的成为舞蹈演员，还有的当了糕点师、设计师。最让刘玲珊感动的是，有学生回到特殊教育学校，成为像她一样的特殊教育教师。

解开隐形的锁

许多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经过系统学习、能够有效交流后，会转入普通学校就读。然而，衔接式融合教育的不足，导致普通教师和学生往往对这些特殊的孩子缺乏认知，难以帮助他们融入学校，使他们感到被孤立、被漠视。

“学前聋儿康复语训班”，刘玲珊担任负责人。相较于之前，这类班级的孩子年纪更小，沟通和自理能力更差，几乎是一张白纸。在对孩子和低龄学生的训练过程中，刘玲珊逐渐探索出“唇舌操”“情景教学”“合作学习”等教学模式，并开始自编语训教材。

与普通教师不同，特殊教育教师的“一届”学生，往往是从小学带到高中，一个班里十几个学生，最多会带12年。刘玲珊务实的教学方法，给这些孩子找到了一条出路。34年一线教学生涯，她教导的80多个听障孩子，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。这些孩子有

子在不到1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。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，刘玲珊真切认识到了命运的无常。

她深知，听障儿童越早进行康复训练效果越好，儿子仍有可能正常说话。考虑到康复训练的长期性，舍不得离开学生们的刘玲珊，决定自学听障儿童语训教学方法教导孩子。于是，她白天上课，晚上教孩子发音和听力，还抽时间翻阅大量资料，摸索教学方法。儿子到两岁半时，已经能像普通幼儿一样发音了。如今，儿子已顺利考入大学，语言交流与常人无异。

2008年，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

是老师也是母亲

2005年，刘玲珊做了母亲。然而，儿

